

抗战与建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汪朝光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其内外政策做出一系列重大调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抗战与建国并重的施政方略,并进行组织机构改组,扩大民主参与,力图支持持久化的战争。然因内外种种因素的作用,国民党的抗战建国方略未能最终实现,其间之利弊得失,尤值学界探讨。

关键词 国民党 蒋介石 《抗战建国纲领》

1937年7月,因为日本无休止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不能不起而抵抗,并从此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战争改变了中国。由战前的相对和平环境^①,进入全面的战争环境,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教、社会等等方面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原先的治国理政构想,也因此而经受严峻的考验,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做出必要的调整。为此,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在战时政治中心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并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使命,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从而决定了国民党战时执政的政策基本面及其领导架构。本文讨论的重点,即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从酝酿、召开到讨论、决策的过程,并探究其意义所在,期以求教于学界同仁。^②

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酝酿和召开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军队虽然作战屡屡失利,但在战场上还是表现了英勇作战的精神以

^① 1927年国民党当政之后,中国国内的战争包括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始终不断,但这些战争的地域空间特性和时间持久特性,均无法与1937年7月以后的全面抗战相比较,故可称为相对和平时期。

^② 有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战通史类著作中都有相应的论述,但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主要论文有:曾景忠:《有关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研讨》,《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杜世伟:《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张劲:《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述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何云庵、时广东:《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评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这些研究在论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史料运用等方面,都还有颇多扩展的空间,此亦为本文研究之出发点。

及不怕牺牲的气概,尤其是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成为中国决不屈服于强敌的精神表征,“中国不会亡”成为当时多数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坚定信念。惟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抗战来临时,却表现为有些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蒋介石的抗战决策多为召集各方讨论做出,而未过多依赖党的系统,加以党内的某些“老同志”,自恃资格和地位,动辄对各种决策提出意见,遭致外界的诟病,使得党务系统成为国民党执政的党政军三驾马车中,似乎最为外界所不满及批评的一翼。而与此同时,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更使国民党内出现了不少对党的批评。

对国民党的表现,蒋介石颇为不满,曾在国防最高会议“痛言,国民党程度低劣,有亡国之罪”。^①后又在招待留汉口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席上,“斥责数年来党部工作不力,以致我方军队所到之处,不见党部人员或党员之协助或存在”。^②当然,这其中不排除当时负责军务的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和负责政务的行政院都在蒋介石的直接掌控之中,惟有国民党,蒋的权力有所不及,从而通过批评党务系统,为其完全掌控国民党预留张本。不过,其他不少国民党官员对党政军关系的观察和对党务系统的批评大体亦如是。时任军委会五部副部长的谷正纲说,“我再也不愿谈党了”。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认为,“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他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行政院参事张伯勉甚至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他的看法得到同为行政院参事的胡彦远、邓介松的附和。^③王世杰认为,“近日党部受军队及其他方面之攻击甚烈,陈果夫、陈立夫甚愤慨”。^④当蒋介石向其颇为看重的智囊人物熊式辉“询战争前途”时,熊式辉答以“党务太差,毫无力量表现,尤于下属为然,以其各党各派之活动如入无人之境,是诚可虑。若不加以整理,以后将更不堪”。^⑤这些看法或多或少都影响到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看法,因此,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战事将要长期化之际,蒋介石谋划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谋求对国民党有所改造,以使国民党作为党治架构的中心,发挥其在长期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国民党元老、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认为,“蒋先生之欲改组本党,原为必须,因党的前途已无出路,但改组如系扩张现局,容纳各方,在本党没有健全干部之时,尤为危险。因十三年之改组,即系因干部不行而增加生力军,但以后因为本部党同人之不努力,致党权旁落,于是有十六年之清党。在理此时很易完成干部之组织,但十年来泄沓沓益甚,卒能今日散漫不治之现象。如再开放,自必有很大之激荡与牺牲,或因此能磨炼出一部干才亦未可知”。^⑥当然,蒋介石同时亦谋求通过大会而改

①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1937年12月20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6页。

②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1月2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86页。

③ 《陈克文日记》上册,1937年12月9日、23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7页。

④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1月26日,第86页。

⑤ 《熊式辉日记》1938年2月13日, Hsiung Shi-hui Collection Portfolio, Manuscript and Rare Books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U. S. A.

⑥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2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95页。据王子壮观察,“此次大会召集之目的何在,诸位元老迄尚未能明了。据叶(楚伦)先生所述,蒋先生意在改组本党,但党的改组按以前总理十三年改组本党之际,系应时代需要,先行容纳共党分子,经过第一次代表大会加以法律上之承认,选其若干人为委员而已。若谓由党的本身,经大会决议容纳各派,似与党的系统上有不伦不类处,故究竟开会之目的何在,截至目前,恐只有蒋先生个人有一腹稿。不过诸位老先生之意以为,当此抗战紧张时期,一切当以抗战为旨归,蒋先生认为与抗战所必要之手段,此间诸人自无不赞成也。戴先生对于大会有一点颇坚持者,则以此次系第五次全国代表之临时代表大会,在理论上不应有超过五次大会之决议,凡第五次大会所决定不修改总章及所选之中央委员,不应再修改再改选。但此与蒋先生心目中之议案是否相合,殊为问题(如容纳各党派而无彼等之中委,事实上恐亦不易通过)。今姑不论此,他如一般人认为应该决定推荐蒋先生为本党总裁之议案,如不修改总章,此议恐即不易实现也”。(《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3月23日,第423页)

组国民党的领导体系,进而掌控其最高权力,更便于其个人独裁统治的建立。不过,这方面的想法,蒋不便于自己公开说,而是通过其他人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之口而表示出来。

国民党另一领袖汪精卫对于召开代表大会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实行的是常委制,并无理论上的领袖,汪精卫只能作为常委之一在党内活动,不能凌驾于其他常委之上。本来,国民党对于国民政府的最高政治指导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政会”),由汪精卫担任主席,可以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作用,但此前国防最高会议的成立,实际上已经架空了中政会的权力。这样,汪精卫名义上虽然是国民党领导人之一,而实际上则并无直接的权力平台可供发挥。汪精卫从来都是有强烈政治权力欲的领导人,他从国外休养中风尘仆仆回到国内,决不甘心做个政治花瓶,在各种会议上发个言讲个话而已。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其下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政治咨询机构,汪精卫受命主持国防参议会的工作,便谋求扩大其功能,以其为基础,成立有较广泛代表性的民意机关,并且谋划以其代行立法院的功能,从而顺理成章地为自己谋得一席政治领袖之地,而这样的举措又得经过国民党代表大会的通过。因此,虽然汪精卫明白,即便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架构改组,此时他也绝无可能越过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但是能够通过代表大会成立由他掌控的政治组织,也不失为退而求其次之道,故汪精卫也是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积极赞成者。

蒋介石、汪精卫之外,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也主张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各方面的抗战大计。王世杰认为,“中央所拟召集之临时代表大会,将讨论民意机关问题。此种问题之提付考虑,一在调和党外分子不平之气,一在预防华北伪组织假借民意名义,成立某种组织,以反抗党治”。^①据王子壮1938年1月底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傖处所了解,“蒋先生决于最近召集代表大会,以改进目前之党务,惟以总章所限,召集必备一定之手续,只好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为代表,地点在重庆,时间即在三月间,闻其目的在改组本党,使各党派之人悉行加入,以共同负党国之大任,本党之名义或亦将变更”。过后王子壮又记载:“此次大会原意在容纳各方,但闻共党曾召集代表大会,不赞同加入国民党,于是性质一变,决议整理本党,并确定总裁制。党内公意自以蒋先生任本党总裁为名实相符,……再于非常时期,汪先生极主张成立民意机关之国民参政会,同时有若干人则反对之,此事结果自有待于折冲。”^②

鉴于国民党内对召开代表大会以定抗战决策并改进党务的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召开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又有各项程序性问题和代表推举手续等难以在短时期内完成,故193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于三月廿九日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以五全大会之全部代表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③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已迁至重庆,但重要机关和实权人物基本停留在武汉处理抗战要公,武汉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在重庆开会符合法理,在武汉开会则符合实际,重庆与武汉间就此有所商讨。“临时代表大会开会地点,本定重庆,近以交通不

①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2月4日,第89页。

②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月29日、3月26日,第392—393、425—426页。蒋介石当时还有合全国各党派为一大党并由他出任最高领导之意。1938年3月12日,蒋“草拟党政制度改革意见”,其中就有“推定全国各党派最高领袖,确定其负责领导与特许及干涉取缔之大权”的内容,认为“中国目前非此不足以团结意志,集中力量,以支持长期抗战,而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也。”[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259—260页]另据王世杰记载:“此次召集临时代表大会,原以决定本党与共产党之合并,暨民意机关设置两问题为目的。近日共产党方既一面再表示不能并入国民党(蒋先生曾有国民党及共产党均放弃其名称,另易他名之议),于是前一问题,一时迄今尚无解决方案。”(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3月8日,第98页)在蒋介石决定召开此次代表大会前后,抗战军事方殷,国共关系较好,蒋介石一度曾亟图谋划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党,以通过抗战实现消融中共的企图,故召开此次代表大会亦有此考虑,但因中共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③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2月3日、15日,第395、403页。

便,且军事指挥机关既在武汉,指挥长官亦不便离开武汉,遂复拟改于武汉举行。但林主席森仍主在渝举行,则以代表大会,照党章须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举行故也”。^①后经往复商讨,重庆“诸老先生虽勉强允其在武汉开会之请,但衷心不免不快,故林(森)主席决意不去,且有请辞国府主席之准备。戴(季陶)先生亦以临时代表大会绝无权修改总章及改选中委,否则对此会之本身发生疑义,亦拟不往”。^②最后决定在重庆举行大会开幕式,而在武汉实际举行大会的各项活动,以此迁就了双方的需求。

1938年3月29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开幕式,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开幕式,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代读了蒋介石的书面致辞。蒋在致辞中没有多谈正在进行的战争,而主要谈的是党务,提出大会所要讨论的“根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本党自身的改进”。他在致辞中用了不少篇幅批评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其表现是,“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只有党部存在而没有党员活动,也可以说只有党员而没有党的活动,我们只有文字上的党章而没有实在的纪律,只有议案而没有执行”;“党和党员不发生关系,党员和民众不发生关系”,“党员和非党员一些没有什么区别”;“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党在社会上生不起作用,各级党部的委员及一般党员,都不能接近民众,既不知道民众的疾苦,也不知道解除民众的痛苦,党与民众隔离得很远。……党在实际上不能够帮助民众,当然不能够领导民众”。这样的批评出自于蒋介石之口,也不能不说有点振聋发聩的作用。至于如何改革,“使我们的党恢复活力,恢复革命的精神”,蒋介石提出应“改善我们的组织,提高我们的纪律,加强我们的训练”,其实,这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结果又落入他自己批评的俗套之中,即言语多过行动,而对于问题的揭露则总是大于改革的实际行动,实则于事无补。^③当然,蒋介石在致辞中也提到,“关于抗战大计以及政治军事与战时经济教育种种方面,当然要根据检查过去的结果,定出精详的方案来,共同努力以求其实现”。^④这才是本次大会的主题和期待解决的问题重点所在。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29日在重庆开幕后,直到4月1日大会闭幕,都在武汉珞珈山的国立武汉大学举行。大会先后听取了叶楚傖所作党务报告,汪精卫所作政治报告,王宠惠所作外交报告,何应钦所作军事报告,孔祥熙所作财政报告,并就上述报告及各项议程有热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议案,如《拟请在已沦陷区域树立新政治机构案》《在抗倭战争中必须举国一致,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以期完成国军建设案》《为达成长期抗战之目的,必须一致努力推行兵役制度案》《关于党务改革案》《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战时土地政策草案》《确定文化政策案》《请加紧实施国际宣传案》《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行政效率以增抗战力量案》《工业政策实施大要案》《改善保甲制度,确定本党以保甲组训民众之政策,促进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而利抗战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等。这些议案基本以如何坚持抗战、赢得抗战为中心,着重于解决抗战时期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除了一些议案,如党务改革案、建立国民参政会案等比较具体实际

①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3月8日,第98页。

②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3月14日,第418页。

③ 王子壮过后曾有言,“向之会议,偏重形式,决议各案,讨论时既未能认真,会后亦难期其必行,如是因循,盖有十年矣。”(《王子壮日记》第5册,1939年1月28日,第39—40页)

④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之开会词》(1938年3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380页。

而有操作性外,多数提案还是显得比较“虚空”,比较难以付诸实践,从而也就于抗战大计不能起到其应有之作用,这也是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种议案中存在的老问题了。^①

二、《抗战建国纲领》的通过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有时简称“纲领”)。

自1927年在南京当政之后,国民党自奉革命成功,一统天下,蒋介石也有开基立业之念,“建国”,包括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民权政治、民生发展等等方面的内容,便应是国民党的施政主旨和中心所在。惟在推倒北洋武人政权之后,国民党内各派争权夺利,纷争不已,乃至大打出手,被时人称为从旧军阀混战到“新军阀混战”。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内的武争告一段落,文争仍未止息,旋又因1931年以后的日本不断入侵,各种危机接踵而至,“建国”大计始终难以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从容进行。不过,就在如此艰难的内外氛围中,从1927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当政下的各种政治、经济、财政、法律、文教、社会事业的建设,仍然有所进展,并大体立下了后续发展的体制框架。或者说,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引发的战争,国民党的“建国”事业可能还有更多的进展。但是,战争又一次打乱了国民党早先的“建国”构想,如何在战乱中“建国”,再如何在注定持久化的战争状态下“建国”,并又在共产党成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建国”,维持国民党的垄断和独大的一党“党治”地位,成为国民党和蒋介石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还在卢沟桥事件刚刚发生,大战尚未开始之际,蒋介石已经考虑到“建国要在困难中实施,不可以倭患而中止建国工作也”;“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兴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有不在意中也”。^②王子壮认为,“今后苟能于战事方面支持长久,不致为敌人所屈服,我国转弱为强、复兴国家之机会亦在于此矣”。^③如同过后国民党之表述:“战场中虽有重大之牺牲,而政治上并不收获相当之代价,则百年来空前之机会未免失之可惜。”^④于此说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也都或多或少意识到,这场战争,如果从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侵略战争的被动角度去观察,实为中国建设和民众生活之灾难,而如从中国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动角度去观察,则又为唤醒民众、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契机,其中关键又在于如何筹思运用。蒋介石的思考最终外化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4月1日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之中。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开宗明义即声明:“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决议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抗战建国纲领》“总则”突出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地位,强调“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

^① 据王世杰观察:“会议时各种报告——党务及外交,极乏精彩。盖作报告之人,既已预知大会不会有何批评,其报告内容遂愈趋于形式。王亮畴(宪惠)报告外交时,极使会众厌倦,甚至有以铅笔敲榫(桌)促其速结者。”(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3月29日,第105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③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年8月2日,第214页。

^④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致国防最高会议》(1937年8月26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页。

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这也是与此次大会确定的领袖制相一致者。

《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抗战时期应实行之各方面的具体政策纲要:

1. 外交,“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等等。

2. 军事,“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等等。

3. 政治,“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等等。

4. 经济,“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严禁奸商囤积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等等。

5. 民众,“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等等。

6. 教育,“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等等。^①

作为指导国民党战时施政和“建国”的基本政策纲要,《抗战建国纲领》既有对战前国民党施政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如强调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至高无上地位,也体现了国民党因应战时需要的新思考和战时执政的新路线,即突出持久抗战的精神,并为此提出一系列施政纲要,如联合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势力,否认伪政权,发动普遍的游击战,实行计划经济和战时统制,发动全国民众,注重战时教育,等等。与国民党过往通过各种施政纲领的相对保守、脱离实际和大而化之的含糊其辞相对照,此次通过的“纲领”确实比较进步、切合抗战实际而又不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其中最大的亮点则在于政治路线的调整,如实行适度的政治开放,成立参政机关,推动地方自治,保障个人政治表达权利的合法化,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是战前和战时国民党体制外人士的一致要求,也是抗战开始后中共及其他党派向国民党提出并呼吁其实行的重要方面。^②因此,在“纲领”通过并公布之后,舆论的反应是积极的,中共及其他党派也是支持的。《大公报》认为,“此次大会之特值称道者,为充分表现卫国建国的积极精神,而‘抗战建国纲领’,就是此种精神之具体化。我们诵读一过,感觉其内容与半年来各方论者之志愿,大体相符,且有许多是当然必然的事实需要,无可论辩。这个

^①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1938年4月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

^② 鉴于中共在抗战开始后即不断提出各种政治性主张,提出实现全民抗战的各项要求,《抗战建国纲领》的通过,也有同中共竞争的意图。如陈诚所言:“对于克制共党最有效之方法,阙为从政治设施之实绩上克服之。例如政府对于人民应做之事,不待共党批评,政府即先去做。又如铲除贪污,应即破除情面,严厉实行,使青年在事实上,对政府生出信仰来,则共党自然无所借口,以施其技。一言以蔽之,中央及地方加紧实行三民主义,即为克制共党唯一之要诀。”〔《陈诚呈蒋介石》(1938年1月27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295—296页〕

纲领之宣布,一方可以更齐一全国同胞之意志,一方更可以打击敌阀屈服中国的迷梦。我们惟有希望政府必依此纲领,全力推行,则国民一定共同遵守”。^① 原先反蒋的第三党认为,这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以来最进步的一个决议”。^② 中共中央则在下发各地的指示中提出,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应“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用一切方法推动其具体实施”;“赞助国民党的进步与扩大”。^③ 由此可知,“纲领”基本呼应了抗战爆发后国内各方各界之关注及有待解决的一些急迫问题,适应了抗战形势的需要,也体现出国民党力图通过抗战而扩大建构其统治基础的政治意图。

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历史积淀和战时的环境所限,“纲领”仍然不够全面及完善,仍然没能完全满足国民党外各方的殷殷期望。“纲领”提出的政治开放度还是有限的,仍然强调国民党统治的垄断性、独占性和排他性,通篇都没有明确回应其他政党的合法化诉求,故战时其他党派的活动虽实际可为,然在法理上却又处在并不十分分明的“灰色”地带,这是国民党外各方还不完全满意的方面。^④ “纲领”中的不少内容,虽然在理论上完全正确,但又格于种种因素的作用,没能落到实处,反映出国民党执政时期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固有问题。如关于惩治贪污和禁止投机囤积、实施物品平价的规定,宣传性大于实践性,以致到抗战中后期,出现了日渐严重的贪腐和投机行为,并因此而影响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和社会形象,这也是国民党内有识之士所忧心忡忡的问题。“纲领”最为可议的方面,是其主旨名为“抗战建国”,但却没有明确提出“抗战建国”最终所要实现的目标究为何。从抗战的基本出发点——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立场出发,“纲领”甚至没有提出抗战的最终目标究为恢复七七前之状况,还是恢复九一八前之状况,更不必说摆脱近代以来中国面对日本侵略时的不平等地位及其遭受的所有屈辱。因此,“纲领”中所言之“制止日本侵略”便多少显得有点宏大缥缈而不那么贴近实际。

三、领袖独裁制的确立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实行领袖制,并由此确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至尊独裁地位。^⑤

国民党既实行以党治国,党的领导在其统治架构中处在至高地位,而在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常会的集体领导制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中政会又基本停止活动,故就因应战时紧迫的形势而言,国民党党的领导中心何在确实有待明确。就实际而言,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位一体的党政军领导架构中,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早已掌控了军权,并通过新建的国防最高会议,实际掌控着政权^⑥,惟在国民党党的领导方面,蒋介石只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之一及国民

① 《全代会之决议及宣言》,汉口《大公报》,1938年4月4日,第2版。

② 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页。

③ 《中央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1938年4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④ 其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虽然包括了中共和其他党派派的代表,但都是以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各方对此并不满意。

⑤ 除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实行领袖独裁制之外,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并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抗战时期比较具有实际成效和长远影响的举措,有助于在战时扩大民主参与,增加国民党的活力,但因这两个问题牵涉方面甚广,延续时间贯穿抗战的全过程,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涉及,拟另文讨论。

⑥ 在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只承担礼仪性职责,并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在国民政府下属的五院中,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实际掌控政权,而在1938年1月行政院改组后,蒋介石虽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但却通过国防最高会议而可以“便宜”行事,仍然牢固地控制着政务决策权。

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的党权^①,故蒋亦有改组国民党领导架构,以利其完全控制国民党之意。在大会召开前,蒋介石已就此有所考虑和布置,决定“对党不辞领袖”。大会开幕的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提案多主张确定总裁,为抗战与党国计则有利益,为个人计则有损也”。^②前之说法体现了当时的实情和蒋的自信,因为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确实蒋在当时比较坚持抗战;后之说法则多少有些言不由衷之处,盖因总裁的独断权力恰恰是蒋所孜孜以求的。^③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提出:“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④以此为出发点,对于国民党党的领导体制的改变,其内容有多端。3月31日,大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其中言及“回顾数年以来之党务,缺憾殊多,而党政关系,亦往往未臻圆满,若复讳疾忌医,将何以图振奋而尽职责。诚欲增强抗战之力量,必先整饬领导抗战之机构,而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乃为急不容缓之图”。该案提出的党务改进与调整之原则为:1. 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2. 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3. 组织党部之原则。“地方党部在省采取主任委员制,在县采取书记长制,在区以下采取书记制,以补救通常委员制之缺点。”4. 调整党政关系之原则。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的形态。对于政府、军队、国营工商业、学校中的国民党组织,贯彻党的意旨,推行党的政策;加强社会层面的国民党组织发展,运用党团策动。^⑤这些内容中最重要者即为领袖制的确立。

根据上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国民党总章,增设“总裁”专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由“总裁”代行原“总章”中规定的“总理”之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9—15人,为决定党政大计之中央干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执行职务,对总裁负责;另设秘书长,负责党的日常事务。^⑥

国民党确立领袖制,名义上是加强领导中心,实际上则是确立并巩固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总裁的位置,实为蒋所量身定做。会前,国民党元老居正“主张党代表大会之召集,应以推举蒋先生为

^① 国民党五大选出的中常委共有9人,除胡汉民已逝外,汪精卫、冯玉祥、叶楚傖、邹鲁都是曾经的反蒋派,在政治上与蒋或貌合神离或若即若离,丁惟汾不甚过问政务,只有孔祥熙和陈立夫算是蒋的坚定同盟者和支持者。中政会委员25人,人多且杂,主席又是汪精卫,亦为蒋所不能完全控制。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5、29日。

^③ 大会召开前,蒋介石在3月12日曾经草拟了一份“党政制度改革意见”,提出“一、军事时期五院制暂停,以五院院长为最高国防会议常委;二、最高国防会议得以命令为便宜之处置;三、国民政府有紧急处分之特权;四、参政会于军事时期行使立法与监察二院之职权;五、推定全国各党派最高领袖,确定其负责领导与特许及干涉取缔之大权。中国目前非此不足以团结意志,集中力量,以支持长期抗战,而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也”。[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第259—260页]可见蒋不仅志在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志在全国各党派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但因形格势禁,蒋的这个意见未见在大会上提出。

^④ 《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8年3月3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00页。

^⑤ 《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3月3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76—478页。

^⑥ 《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3月3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79页。

国民党总裁,为其主要任务”,并“讽汪精卫先生自行谦退”。^①于右任亦提出,“蒋先生既为本党之领袖,应于代表大会中推为总裁,军事方面应推为大元帅”。^②他们的看法代表了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实所谓形势使然也。^③然是否设副总裁,尤以汪精卫能否出任副总裁,在国民党内的意见却并不一致。蒋介石在会前已有考虑,“推汪为副”。^④但在大会期间,“关于副总裁之设置,会场中颇有人表示不赞同者”。^⑤“设总裁问题,代表中虽一致赞同,但关于应否设置副总裁,则议论不一,甚至有人临时提议不设副总裁,是有若干人对汪先生表示不满。会场空气如此,与原定蒋正汪副之议亦有未符。时丁(惟汾)先生为主席,无术挽救,乃由秘书长叶(楚伦)先生代为宣布表决,以赞成本党设正副总裁之议付表决,二者得以顺利通过。”^⑥

设副总裁之议虽通过,但国民党内仍有不少人对蒋介石规划由汪精卫出任副总裁表示不满,再加汪精卫在会上提议扩大国民参政会的权力,由国民参政会取代立法院执行立法甚至人事同意权,更激起部分参会者出于维持国民党政治垄断地位而对汪的强烈不满。陈果夫遂提议由投票方式选举副总裁,为的就是CC系可以控制选票,以此方式不使汪当选。叶楚伦看出陈之用心,担心汪精卫以得票少而落选,引发国民党内汪派或其他派系的反弹,故反对票选方式,改由主席团提名,大会起立通过。4月1日晚,由吴稚晖将蒋正汪副案提出大会说明,“语极动人,大意谓,十四年总理北上,病逝北平,距今十余年矣。蒋同志和汪同志是总理最相信的,亲同子弟,总理去世后,经十余年之奋斗,本党始有今日,亦以两同志之努力为多。本党得今后,领导得人,必更能迈进,使国家民族同立于复兴之途也云。闻者大鼓掌,全体一致起立,由张治中领导,高呼万岁,热烈空气紧张异常”。^⑦大会全体通过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并代行“总理”职权。据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总理”职权有:“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总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有交复议之权”;“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⑧其中最关键及最重要者为“最后决定之权”,也就是说,“总理”可以个人的意志,决定党的诸般政策大计,不得“总理”首肯,党的各项重要决定即无法付诸实施。在孙中山看来,这是为了应付改组前的国民党组织涣散、意见分歧的局面,由他以“革命”的名义,统一党的意志,实现革命目标。但在孙中山生前,因此项规定之通过不过一年有余,孙中山即病逝北京,故其实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并不大。此次蒋介石以抗战的名义而得此权力,既有因应战时状态、集中权力、坚持抗战的需要,也有蒋个人对至高权力的追求,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蒋介石成为孙中山之后国民党领导权的当然传承者,这也是各方面形势发展演进之所导致的结果。

自孙中山逝世至国民党当政,国民党军权已为蒋介石所掌握,政权大半为蒋介石所控制,蒋已实际处在国民党执政的中心位置,基本掌控了军政大权。惟就法理而言,国民党党权则始终处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所谓三巨头的争夺中,一直无法完全归于一人。即便蒋介石通过陈果夫、陈立

①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1月28日,第87页。

②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月29日,第392—393页。

③ 据《蒋介石日记》(手稿)所载,在他与汪精卫商议代表大会事项时,汪精卫对国民党设立领袖制似不以为然,“彼实不愿有党魁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11日〕对始终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地位而又时时不得意的汪精卫而言,有此想法倒也符合其心境。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5日。

⑤ 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3月31日,第105页。

⑥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3月31日,第429—430页。

⑦ 《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4月1日,第430页。

⑧ 《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1月28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25页。

夫兄弟的CC系大体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但因其历史渊源及现实关联,蒋多半被认为是军人而非党人,使得国民党党权不能集于蒋,结果造成军政权和党权的某种分离,这又与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念相违背,不是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国民党五大之后,胡汉民逝世,汪精卫远游欧洲,国民党党权逐步开始了向蒋介石过渡的过程。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领导层中不少人对抗战信心不足、妥协倾向甚为浓厚的氛围中,蒋介石顺应时势、力排众议、整合内部,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坚持,确实表现出较国民党内其他人对国内外大势有更高的眼界、更准确的判断、更有力的把握,起到了在国民党内的核心领导作用,并为国民党内外所首肯和拥戴。这样,经过十年有余的经营,蒋介石内有国民党多数干部的支持,外有领导抗战的声名和因应战时状态的实际需要,他成为国民党的领袖可谓水到渠成,无人可与争锋。此时此刻,即便是汪精卫这样具有历史声名、长期追随孙中山左右、为孙中山笔录遗嘱、自诩为“总理信徒”而又有强烈政治领袖企图心的人物,也只能承认现实,对蒋可以有腹谤而无法公开反对。从此以后,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法理上,蒋介石都成为国民党及其统治架构中说一不二、手握一票否决权的真正的独裁领袖,“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者更趋于所谓‘法律人格一元化’了”。^①这样既有利于国民党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和对抗战的坚持,但也使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不能不仰承蒋之意而难有民主的讨论,再加蒋介石个性的独断、固执和对小事细事的喜好,总裁手谕或手令满天飞,国民党的决策机制只能听命于蒋个人而逐渐固化僵化并失去应有的弹性。^②

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当然是志得意满。他一方面表示,“惶恐惭愧,明知责任重大,然不敢谦辞也”;一方面又表示,“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③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中国军队正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激战,并在大会结束后的一周内全面反攻,将日军驱离台儿庄,获得声扬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也为刚刚成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挣足了脸面,从而使蒋的声望达到了抗战以来的新高峰。此时此刻的蒋介石,或可有充分的自信与可能,实现他的“抗战建国”理念。而汪精卫当选国民党副总裁,虽然貌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深知副总裁不过是个名分或摆设,并无什么特别的权力,却使他由此即便在名义上也位于蒋之下,甚至还不及不设总裁时,他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蒋任副主席,至少名义上蒋在国民党内还在他之下。所以,据当时人的现场观察,大会中“汪先生与蒋并立一处,面容惨白”^④,可见其心情如何了,或许于此亦埋下了过后他出走重庆投敌的远因之一。^⑤

四、蒋介石的两次演讲

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有多次演讲,其中两次比较重要并值得注意的,是4月

①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18页。

② 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曾经在私下写道:“总裁最后决定权不可常用,必万不得已或有半数反对意见时,乃偶一用之,若平时共同一致时,更不必用矣。领袖处事,未定之事应先洽商下问,既定之事则可授意或通告,使之明了意图也。”[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第423页]但问题在于,蒋既有了最后决定权,无论他是否使用,国民党领导层的其他人在提出各种意见时,都不能不先考虑蒋是否能接受,以免做无用功,这就使国民党的各项决策自然趋向于服从蒋的意旨,更不必提那些本来的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了。很快,各种对蒋介石的吹牛拍马、个人崇拜言论便充斥于各种官方场合和官方传媒,以至连蒋也认为有点肉麻和不安,表示“对于党部服从最高领袖与领袖万岁之口号应令取消。”[《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8月29日]不过,当这样的言论和口号四处充盈,并且使蒋习惯之后,所谓“取消”之类的话更多地也不过成了蒋的个人表白而已。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4月1日。

④ 《陈克文日记》上册,1938年4月2日,第198页。

⑤ 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投敌后,长期追随汪精卫的甘乃光说:“汪先生此行恐不止共产党问题意见不合。这一年来,他在政府里固然没有甚么地位,即在党里,虽有副总裁之名,亦不过徒有其名,许多措施他从来不曾知道。这是大足以引起他的无名悲愤的。”(《陈克文日记》上册,1938年12月23日,第319页)

1日他在大会闭幕当天所作的两次演讲,其中之一为闭幕词,这是大会的规定动作。蒋在闭幕词中除了再次提出改进国民党的党务之外,还特别强调,“目前比较重要的问题,还是国内团结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家内部能够团结一致,始终不渝,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他认为:“这半年多以来,我们国内团结已有良好基础,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这个团结,造成统一的力量,为国家民族解当前的艰难,谋百世的福利,也就是本党如何领导全国团结各党派的问题。”为此,他提出,“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对于国内各党派和全国国民,都要以先驱前导的地位,尽到提絜共进的责任。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豁达大度,尽量容纳,一方面要以大党的精神,负起责任,竭诚指导”;“要拿‘以大事小’的道理来对待各党各派。……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虽然在蒋的心目中,处理各党派的关系是“以大事小”,是“容纳”和“接纳”,国民党仍然处在老大的地位,但毕竟与过去完全不承认他党存在的做法显出了一些变化,反映出国民党在对外战争时期争取政治盟友的迫切需要。

蒋介石还在闭幕词中特别用了一段话谈国共关系问题,提出:“现在国内实在也没有多少党派,过去与本党有过斗争历史比较长久的自然是共产党。我知道各位同志关于今后如何对共产党的问题,一定有许多意见,……我想他们总能够度势识时,履行他对本党的宣言。以后他对本党的态度如何,虽然为本党同志和全国国民所应该深切注意,但是我们是当政的唯一大党,只要我们本党本身健全,能够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他们一定是要受本党的领导。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完全要看本党同志今后能否自强自立,能否真正努力,由改造个人来改造本党,复兴本党。”^①这时正值日本大举侵华的进攻作战时期,也是国共实现二度合作之后关系最好的时期,蒋介石的上述表示虽然还有例行公事般的对共责备之声及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其对共宣示的主旨却比较温和,重点落脚在国民党如何实现自身改进的方面,也算是其当时意图“感化”和“融合”中共人国民党,以化解中共未来可能对国民党的威胁的“苦心”之所在了。

蒋介石在大会闭幕当天的另一次演讲,以《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为主题,系统阐释了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提出了对于抗战前途若干值得注意的解读。蒋在这个演讲中提及当年孙中山所言之“恢复高台,巩固中华”,“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等说法,并由此引申,特别解释了对于东北问题的看法。他说,“有许多中外人士都怀着一种见解,以为东北问题如果当时能设法解决,这次中日战争,就可以不发生”。但是他强调,“我们并不是不想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之不能解决,责任完全在日本”;“完全是由于日本军阀不讲信义,日本政府不能负责,解决之后,没有保障,因此当时就无法可以解决!后来卢沟桥事件发生,这个问题,就更无从提起了”。他还提出,“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可是日阀用心,和我们适得其反,我们除了以坚决抗战来觉悟其迷惘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来求取东亚的和平,现在战争既起,就必须我们全国下定决心,增强团结,始终一致,不屈不挠,来贯彻我们抗战的目的!”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失去东北,无论当时在东北当政的张学良有多少责任,都是令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不能不感觉难堪之事,尤其是在面对外界的公开批评之时。还在中日全面开战之前,蒋介石就曾在多个场合对国民党当时的政策有所解释有所辩白,而在战争开始之后,究竟这场战争最终要达成何等目标,是恢复卢沟桥事件之前的状态,还是恢复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也需要对国民党内外有所宣示,方才便于战争动员,使军队和民众都知晓,我们究竟为什么打这一战,打这一战要达成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国民党在战争开始之后,对于

^① 《闭幕词》(1938年4月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10—512页。

为什么打这一战的宣传比较广泛深入而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即不打这一战,就是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灭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亡国灭种”,所以必须打这一战。但是,对打这一战要达成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国民党在宣传上却有些含糊。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着重强调的是恢复卢沟桥事件前的状态,显然这其中并未包含恢复东北主权,即便实现这个目标,也是恢复不完全的国家主权。而在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中日两国实际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此后国民党反复强调的是“抗战到底”,但这个“抗战到底”究竟意味着什么,抗战之“底”究竟何在,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说明。

就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的论说而言,虽然提到了东北问题以及其他中日“悬案”需要在“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的前提下得到解决,但也未明言其具体内容究如何,什么状态是“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不似卢沟桥事件后的庐山谈话那般明确提出四点不可退让的底线主张,而孙中山“恢复高台”“解放高丽台湾”等言论,似亦不能简单理解为是收回台湾。故此,至少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仍然不能认为国民党以及蒋介石对于抗战的终极目标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可能是个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发展演进的过程,而从中国的国力军力、经济社会状况、对外关系等方面去观察,这也是个可以理解的过程。^① 换个观察的角度,也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征服中国而毫无顾忌地野心和狂妄,恰恰从侧面不断坚定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从而使中国在艰难的抗战历程中,逐步深化并最终确立了抗战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恢复卢沟桥事件前的状态,而且是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直至恢复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的状态,收回华北、东北、台湾等所有曾经丢失的国土。

蒋介石在这次演讲中还提到了国内的党派问题,他说:“按理,在本党统治的政府之下,已不会有第二个党存在,更不会在三民主义以外更有第二个主义产生,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其他的主义存在其他的党派发生呢?这个与其说别人树立党派不对,毋宁反躬自省,承认自己不争气之所致!……唯其我们自身不能尽到责任,以致党没有力量,党的基础不能深植于民众中间,所以才有今日之现象,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反问诸己,而不能责怪他人。现在敌人压境,国家到了非常时期,本党以外

^① 在大会闭幕演讲前,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演讲主旨曾有记载,如二次提到,“言和条件如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一和”;“如敌果有和平诚意,若无制命伤之条件,以仅解决满洲问题为限,则不惜与之言和,然未到时也”。这里的含义似乎是在东北问题上可以有退让,所以才有“不惜一和”的说法。而另一处则提到,“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这里的含义又为不能放弃东北,否则便是“永无和平”。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前后矛盾之处?其实,这不过反映出蒋介石的言论不时有相当感性之处,遣词造句未必都那么讲究,所以在蒋的日记中,“最好”“最坏”“最重要”“最关键”等等这样用“最”字的说法比比皆是,而“最”字一多,也就不成其为“最”了。因此,所谓听其言固然需要,但更多地则需要观其行。当时蒋介石在行动上对于“抗战到底”是比较坚持的,这其中对国内外大势的观察所得,也有蒋个人的认知和判断。他认为,“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由此出发,对于“抗战到底”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当时在蒋介石似亦无确切的把握,也是个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故他所言“只要于国有利,则一切和战责任我愿不顾一切,负责断行,但此非其时也”,倒不失为其真实心态的反映。〔《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2日、23日〕据王子壮记,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期间,东北代表王卓然和中共代表林伯渠等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十二月廿六日驳斥近卫廿二日声明抗战到底案”。他们“均主张发表宣言并表示抗战到底之意义,最应以收复东北四省为初步,俾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之状态,则比较严重。盖以蒋先生在五中全会之解释,初步应以恢复平津为目的,盖此次抗战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起因,故结果亦应以恢复七七以前之状态为结果,至完成抗战自尚应待进一步之努力也。……此种解释究与最高当局之步骤有违”。可见至少在王子壮看来,收复东北是否作为抗战到底之终极目标仍有疑问。但其后蒋介石于29日在会上报告,谈及“所谓抗战到底之解释,是否以恢复九一八以前之状态,事关军机,不宜轻易对外宣布,亦犹抗战以前所谓最后关头之认定,亦由余负责军事全责之观点,统察全局,加以确定,事关军机,尤不应事先宣布也。收复东四省,当然为国民政府之责任,不特此也,即收复台湾,使高丽独立,亦为政府之责任,但实施之际,要有步骤及计划,不应公然有所表示也”。(《王子壮日记》第5册,1939年2月17日、29日,第68、73页)于此观察,又可知蒋心中有收复东北和台湾的规划,但既然不对外公布,亦可谓蒋的决心至少此时还不那么确定,还在待机之中。

别树党派的人,已经明白宣言愿意抛弃以往的政策,服从本党政府,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这种态度,可以说是革命者很好的态度。本党同志即应宽宏大度,从国家利益上着想,开诚接纳,俾能共同一致以对外。如果他们已有这样觉悟的表示,而我们还要再事根究,不但多事,亦徒然损失领导革命的尊严。我们应该在法律范围以内,容许他们的自由,在本党三民主义指导之下,统一他们的行动。集中全国的力量,来为国效命!”^①此处的演说主旨与蒋在闭幕词的演说主旨是大体一致的,反映出抗战之初蒋介石对于国内党派问题的基本看法,即“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使之就范,而不加强制”。^②在这样的看法之下,无论是国共关系,还是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关系,当时都还维持着大体良好的局面。

五、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

1938年4月1日夜12时,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宣告闭幕。宣言声明:“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吾人不能望于和平中谋建设,惟当使抗战与建设同时并行,是则救亡的责任与建国的责任,实同时落于吾人之肩上。惟望全国同胞,以一致之团结,为共同之负荷,使此捍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得以完全达到”。宣言回顾了若干年来的日本侵华史,解释了执政党和政府由“忍耐”而至“牺牲”的历程,提出抗战的目的是,“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确保,自由平等之国家亦由此以实现”,并宣示“吾人为达此目的,决不辞任何之牺牲”;“并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宣言两次提到“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但未明确解释“合理解决”的含义究为何。宣言表示:中国对外谋求和平正义,致力自由平等,遵守国际条约,增进国际友谊;对内贯彻三民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增进民权,组训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参政机关。为了表示国内团结和国共合作的意义,宣言还特别提及,“(民国)十三年以后,更改造为中国国民党,集合全国有志之士,共同奋斗,使扫荡军阀,统一中国之工作,得以告成。凡此皆足证明,倘其主义及政策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则必能得有志之士加入团体,共负责任,以期主义及政策之实现”。^③

在突出抗战意义、宣示抗战决心方面,《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坚定不移的表达,足可使国民党内外对抗战怀疑动摇者明晰国民党对抗战的坚持,有利于抗战时期的国家动员和民众动员,亦可使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知晓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故其对外宣示的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表述,这也是国民党召开此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意义所在。蒋介石认为,“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团结党内,统一国内,使之坚强,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④惟在如何实行抗战建国的政治改革和民权政治方面,宣言表述较为简要模糊,对于如何发展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强调的是授权政府、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国家至上,“杂然各殊之政

①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389—403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5日。王世杰从旁之观察亦为,“关于共产党问题,蒋先生主张采宽容态度,逐渐导本党以外各党各派入于法律轨道,一面努力增进本党工作”。(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4月1日,第106页)

③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4月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61—476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5日、26日。

党,亦必相约为政治的休战,以一人民之心思耳目”。就战争状态下的国内政治而言,此固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也反映出国民党对于抗战建国规划的政治保守性一面,对于开放战时政治的顾虑,担忧影响其垄断统治地位。宣言篇幅长达近万字,显得冗长拖沓,且文句不够明白晓畅,不利于其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广大低文化阶层中的普及和宣传。有意思的是,宣言中还特别用了二节篇幅论述抗战时期如何加强道德修养及如何推动科学运动,所谓“礼义廉耻,纲举目张”;“物质与精神相贯通,理智与感情相贯通”。这些看上去正确合理而循规蹈矩的文辞,在血火拼杀的战争背景下,确实显得有些空洞,有些离题,有些令阅者不明所以,难以为一般民众所认知,甚而在彼时彼地,也未必是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关注重心,于此亦反映出国民党领导层的精英特质及其政治语境,对于如何理解广大普通民众的所思所念所求所为,其实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也如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致辞中所批评的,“既不知道民众的疾苦,也不知道解除民众的痛苦,党与民众隔离得很远”。这也是可以解释国民党其后虽在抗战中付出甚多,然其政治地位却不断相对下降的观察角度之一。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凸显了在急迫的战争形势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抗战到底”的意志和决心,提出了“抗战建国”的路线和方针,确立了国民党的领导中心,呼应了社会各界与广大民众的关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在国民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民党自身的宣传姑不论,国民党的政治竞争者中共,通过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亦对此次大会给予了较高评价。《新华日报》社评认为:“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基本的方针。”社论肯定了大会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内政政策的重大进步,提出“这些政策都是争取抗战胜利必要的条件,须要用最大的力量,使之真正在有利于抗战与团结的原则之下,具体的实现起来”。社评表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信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①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勱、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分别致函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大会宣言及各项决议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旨”,“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并望国民党继续扩大民主,体察民意,实施宪政。^②

以战争形势和内外国情所决定,抗战既为持久战,则在持久的战争状态中,军事固然重要,支持军事的政治经济社会面更为重要,因此,国民党提出抗战与建国并重,自无可非议,并且可以理解为其对于战争因应的正确决策。惟建什么“国”,如何在战争状态下建这样的“国”,又是对国民党的严重考验和挑战。由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观察,正是在这方面,国民党交出的答卷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抗战建国纲领》的多方面内容,并未在抗战中得以实现,最终使国民党的“抗战”获胜而“建国”失败,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在经过了这场战争之后不升反降,从而也预伏了国民党过后在国共角逐中失败的远因。当然,这又是另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主题了。

[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新华日报》,1938年4月4日,第1版。

②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1至6月份),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386、404页。